◆纵　横

以公正祛除社会戾气

在我们社会，有些人不喜欢讲理，没有讲理的习惯，他们习惯了吵闹、抖狠和私力救济，这已经成为本能反应。但一切的习惯和本能反应，本质上是社会驯化形成的习惯性反应。这就像一个孩子，其性格与行为模式既非与生俱来，也不是他无师自通，而是家庭与社会环境跟他互动的结果。个体的戾气理应受到社会的鄙弃，但社会作为个体成长的环境也需要反思。

长期以来，有些领导干部处理问题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有时候这种态度让闹事者得到了好处，有的时候则是牺牲弱者、成全强者。结果弱者遂将戾气作为筹码，来“对冲”强者的优势。

要祛除社会戾气，对非法使用暴力者予以依法打击是必要的，但我们想要的恐怕是把人们造就成“好脾气”的人，这需要社会本身有一副“好脾气”。我们要求人们讲道理，而不是动辄诉诸暴力，这需要全社会都来讲道理。只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才能培育出懂得珍惜公平正义的个体。如果讲道理能够解决问题，个体就没有理由放刁使蛮。

民德本质上是一个教化问题，它需要大家以身作则。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国有句话，叫“俭以养德”。其实，社会公平正义最能养成全体国民的道德，进而使社会成为一个有德的社会。（2015年7月21日 光明网 杨于泽）

◆观　点

土地收入饥渴症缘何难解

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土地财政被公认已经枯竭的情况下，土地出让金仍然创下新高，确实是一件需要认真关注和思考的事。据专家推算，过去十多年里，各级政府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已经超过40万亿元。但是，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块短板，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道障碍。

具体到土地出让金上，过去的十多年中，高达40多万亿元的收入从土地走进了各级政府的腰包，为什么反而出现政府负债急剧上升的现象呢？这些资金到底都投向了哪里，投资效益又如何？

显然，从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来看，化解债务的效果并不明显。一方面，由于地方债务绝大多数都是依靠银行等形成的，财务成本非常高。纵然地方政府把土地出让收入全部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对债务总额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20多万亿元的政府债务，仅利息开支就要2万亿元左右，加上没有列入政府债务范畴的融资平台债务，4万亿元根本不够支付利息。那么，土地出让收入也就基本是为银行、信托等服务的。

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缺乏发展经济的理念和思路，仍然想通过土地财政搞城市建设，因此土地出让收入不可能都拿来偿还政府债务。去年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土地出让收入4万多亿元，说到底，还是大搞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结果。即便多数城市已经面临严重的供需矛盾，商品房库存十分严重，但只要有空间，就不会丢下房地产，不会丢下土地财政。地方债务也就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了。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状，为了避免发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央被迫采取债务置换的方式，给地方以喘息机会。只是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地方很难因为中央的救急而转变发展理念，而不再以负债的方式进行城市建设。反而又萌生出大搞土地财政的热情，继续在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上做文章。现在，很多地方想方设法通过所谓的PPP模式，重拾土地财政，以此来拉动增长、拉动政绩。只是社会资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冲动，因此，尽管地方推出了数万亿元的PPP项目，得到社会资本响应的却寥寥无几，有的地方甚至没有社会资本过问。

如何激活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的投资热情，已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土地出让金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活性炭”。绝大多数项目只有在有土地出让收入做承诺和保证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才愿意介入，PPP模式也才有可能见效。所以，只有把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办法、使用目标、使用渠道等向社会公布，以此来打消社会资本的担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PPP模式的作用。（2015年7月14日《经济参考报》谭浩俊）

◆评　论

这是一个自拍的时代

近期，深圳因房产新政正在上演着强行收房的闹剧。那些卖方明知道违约，依然在利益与契约之间坚定地选择了前者。尽管当地法院未能及时启动司法程序，但所有人明白的是，个中对错是非的判定，司法度量是维护公平底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尺。

只是，舆论所探讨的空间，已然超越了司法的维度，中国人缺少契约精神的言论随之而来。与传统思维中趋利避害的解释相比，当下因技术发展所衍生的另一个社会现象，似乎亦能映照出一些缺少契约的原因。

不久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便是以这个社会现象破题。“这是一个自拍——还有自拍杆的时代。仔细想想，如果社会里的每个人都开始过上整天自拍的生活，这会是怎样一个社会呢？”福斯特将这个自拍时代的病灶，定义为类似于深圳强行收房卖方的那种只顾自我利益的“利己主义”。

的确，在自拍的时代里，人们只关心自己，容貌必须美丽，身体永远诱人，所有的社交与人际关系，犹如移动互联所构筑的业态那般，都是以自我为主角来展开的。但对自身之外的人间义理、社会规范，则用心不多。

医生可以站在病人的痛苦与隐私面前自拍，路人可以以恐怖组织挟持人质的节骨眼为背景进行自拍……于是，自拍成了现代人几乎无所不在的生活仪式。只是有些自拍背后尽管溢满了甜言蜜语，充斥着“我在现场”，但终究这些自拍所展露出的“自恋”，是以虚假漠不关心别人为基础的。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的自拍是无意识的一种举动。也恰恰就是这种无意识，让人对自拍时代心生了些许的恐惧。这不仅仅表现在，我们不停地为自己打算、我们对生活放弃了用心体验并一味地保存、分享这些具象的肤浅层面，更是表现在以“我”为主角的自拍潮里，人只看到自己而非社会关系，无数努力所希冀的公共化精神，逐渐分解为“我的小世界”。

原本，技术革新所塑造的以“我”为中心的时代，属于市场空前胜利的时代。因为历经市场商业所训练出的文明，都是以原子化个体为预设的。只是自拍成了风尚后，那个在英国诗人弥尔顿认为的“虔诚的、光荣的自我”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则是人们开始崇拜自己、美化自己，并且炫耀自己。这个过程中，个体价值彰显必须与公共空间的规范同步进行的常识，惨遭遗弃。

就如同深圳强行收房的卖方，如果肆意的违约得到法律的让步，他们一时的得逞，并不足以保障房子的保值，谁能预测今日法律可以为违约开绿灯，来日法律不会支持强盗侵占他们的房子？

利己主义能够得以持续，前提是要不损伤他者。这是自拍时代人们所必须要明白和恪守的原则。在自拍的时代里，通过各种技术修饰、美化，能够展现一个近乎“完美”的自己，但只要不是我们独自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自拍”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无视他人的利益，以及那些不幸，我们就有责任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情，至少要让公共空间的秩序更加规范，社会公平的底座更加坚实。（2015年7月8日《长江日报》马想斌）

全民族的真正觉醒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企图唤醒中国这头沉睡狮子。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海国图志》，已经萌生要将中国改造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思想，但在中国没有引起反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书籍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惊醒这头睡狮，还需要更惨痛的失败。

这一失败来了：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睡狮开始觉醒。觉醒进程仍然是一个数十年的历史过程。

甲午战争后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觉醒。这个阶层一些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整个国家出了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

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抗日洪流浩浩荡荡，中华民族的觉醒不可阻挡。正是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才使中国人民空前地团结和觉醒起来。爱国主义成为抗日战争凝聚中华民族之魂，是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一面旗帜。正如朱自清在《这一天》中所写：“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片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2015年8月13日《北京日报》金一南）

厘清国家战略与大战略的科学内涵

迄今为止，在国家层面影响较大的战略概念仍然是大战略和国家战略。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关系？在我国，使用哪个概念更科学、更合理、更便于交流，也更符合中国国情？分析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搞清楚人们赋予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关于国家战略与大战略的关系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国家战略和大战略是两个涵义相近的概念，两者可以互相通用。对此，我国台湾学者钮先钟明确指出：“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新创的国家战略，即为欧洲人所早已惯用的大战略，这两个名词之间实际上可以画等号。”钮先钟的观点比较符合美国的情况，因为美国人对国家战略和大战略的界定极为相近。正因如此，美国学术界的许多权威学者研究相关问题的学术著作，往往使用“大战略”这一概念。

其二，国家战略是一国本身的战略，大战略是国家集团或联盟的战略。持这种观点的是我国台湾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国家战略“系指国家政策阶层对于统和国力之建立与国家战略之运筹而言”，大战略“系指与同盟国间所运筹的战略政策阶层而言”。与台湾学者上述观点类似，日本学者伊藤宪一也认为国家战略是对内的，大战略是对外的。至于二者的关系，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

其三，国家战略是国家的总体战略和最高战略，大战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国家安全战略。对此，国外学者认为国家战略是位于大战略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战略，所不同的是一种将大战略界定为国家安全战略，另一种将大战略界定为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战争战略。

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家战略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丰富和充实——凡是事关国家全局、长远和根本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在国家战略的研究视野中，都是国家战略所应研究的问题。就内容而言，国家战略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军事、民族、地理等诸多领域，其空间范围，既包括国内战略，也包括国际战略——国家战略在国际舞台的延伸。因此，国家战略不仅是涵盖范围最广、涉及领域最多的战略，同时也是层次最高的战略，是国家的最高战略。

有鉴于此，建议在我国研究相关战略问题时，最好使用国家战略概念。这样，也比较符合现代汉语的语言习惯。例如，在当代中国的战略研究中，人们往往按照研究领域或研究问题来界定战略概念，如经济战略、社会战略、文化战略、军事战略、外交战略、地区战略、国家战略，等等。现代汉语的这种表达方式，既简明易懂，便于交流和沟通，又能有效防止和避免歧义。特别是在中央已经使用国家战略概念的情况下，学术界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不使用国家战略概念，而使用“大战略”等概念，就不利于官、学两界的交流与沟通，更不利于发挥学术界在国家战略决策中的咨询和智囊作用。（2015年第7期《中国行政管理》薄贵利）

提高公共安全体系的执行力

8月12日晚，天津港国际物流中心区域内瑞海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举国震惊。抢险救援仍在坚持进行，事故调查还要走很远的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安全”关切势必会成为焦点。在天津这样人口和产业密集的区域发生如此严重的安全事故，无疑会成为公共安全上一响沉重的警钟。

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很难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些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反响也极为强烈。比如经媒体曝光电梯伤人事故后，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了电梯安全排查工作，可谓是立竿见影。

过去很多事故原因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有迹可循。但很多涉及安全生产的规章与程序本身是完善的，条目详细清晰，要求也很明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执行是否有力则未必可以打包票。

安全机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讲究科学合理，有备无患，规划设计和维护保养是日常主体。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安全保障机制的执行得不到有力的监督，一道道程序被忽视与突破，相当于整个安全体系被瓦解，但遗憾的是，往往只有到最终发生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才引起反思，追悔莫及。

国家高度重视人民安危，在任何工作中都将安全第一作为前提。今天，要说哪个方面还缺乏可遵循的安全规范，恐怕很难。对整个社会来说，保障安全的执行力首先是长效机制的落实力，高度可靠的监管力，然后才是事故或灾害的救援力。此外，保障安全的执行力还包括每个人在安全事故中选择得当方法的应对力，全社会面对安全事故或灾难时意志统一的行动力。唯有以落实力为基础形成安全保障的合力，社会安全网才会坚实稳固。（2015年8月14日 解放网 李杏）

◆史海钩沉

走向全面侵华的日本

“日本治下的和平”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一次著名的内部演讲，史称“天羽声明”。他宣称：鉴于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大陆也就负有“特殊责任”，“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日本有责任单独行动……并反对中国采取任何以夷制夷的政策”。假如其他欧美国家希望给予中国政府以经济、技术以及军事方面的援助，势必会“给日本和东亚带来严重后果”，东京将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

天羽鼓吹的所谓“特殊责任”，本质上是要建立日本对东亚大陆的排他性统治，以在西太平洋实现“日本治下的和平”。在鼓吹“大陆政策”的军事扩张主义者看来，英美“垄断了巨大的资本和丰富的天然资源，兵不血刃地压制其他国家的人民、使之不能自由地争取民族利益的经济帝国主义”（近卫文麿语），绝不可能坐视日本发展壮大；东京若想发展和平的商业帝国主义，始终会遭受英美的压制和掣肘。唯有在东亚大陆取得独占性的能源、矿产和耕地，使之成为仅服务于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间”，日本才能在不依赖外界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壮大。

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恰好与中国的政治再统一发生于同一时期，并迅速形成对立。国际关系史家入江昭在代表作《帝国主义之后》中指出：30年代的日本当局目睹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攻势、蒋介石统一全国军政的努力以及与欧美强化关系的尝试，焦虑感一天天地加深。中国即将在国民党领导下恢复经济和政治统一，成为一个独立、亲英美的大洲级陆上强国，彻底排除日本的军事蚕食和经济渗透，这样一幅图景令本身仅是一个中等强国的日本倍感恐惧，生出了加以阻挠的愿望。“天羽声明”强横的用词，便是一种“预防性扩张”心理的反映——日本明白地昭告世界，尽管中国重新统一的步伐正在加快，但东京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自己对“生存空间”的独占权。1936年，“确保帝国在大陆的地位”又被写入了《国策基准》。宣称要在东亚大陆推行“共存共荣主义”，排除苏联威胁、实现“日满中三国的紧密提携”，并逐步向南方海洋进军。这意味着扩大侵华方针的确立，避免与英美为敌的传统也已经被颠覆。3个月后，日本还与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从而完成了亚欧军国主义的合流。

侵略：在中苏之间的选择

在中国的复兴浪潮中，日本最关注的是军事现代化进程。从1928年起，蒋介石就聘请德国军官担任顾问，参与中国内战和国防改革的筹划。1934年，前魏玛共和国陆军统帅部长西克特大将率一个庞大的顾问团抵华，开始按照“一战”后德国重建国防军的思路，为中国军队制订革新编制、更换装备、调整战略战术的方案；德国军火企业和工业康采恩的代表也趁机进入东方市场，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往来。1934年，中德两国代表在庐山签署《合步楼协议》，中方承诺通过德商合步楼公司（HAPRO，即德语“工业制品商贸公司”的缩写）向德国出口钨、锑、锰等战略物资，换取德方提供的工业产品和军火。另外，德国政府和国防部还将各自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的无限期周转贷款，以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筹建包括冶金、燃料、机械、电气、化工在内的17个重工业厂矿。

到30年代中期，德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日本平起平坐，中国也成为德国军火最大的买家之一。1936年，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武器占其军火出口总额的28.8%，长期以落后挨打形象出现的中国军队开始接收包括新型榴弹炮、轻型坦克、鱼雷快艇、水雷、机枪、轰炸机、钢盔以及通讯器材在内的各种作战物资，物质和精神面貌都有了显著改善。西克特及其顾问团还提出要为中国编练60个德国编制、德式装备的步兵师，在6年内完成。至1937年中日开战前，已经有4个师完成了德械换装，另有15个师结束了编制调整。1936年日军参谋本部在修订年度作战计划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军备不断发展，过去那种局部作战行动恐怕难以达成目标”的顾虑。

中国国防力量的强化并非此际日本面临的唯一考验，莫斯科同样也在强化驻远东地区的兵力。1932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告完成，国防工业实力有了显著提升；为应对伪“满洲国”的出现给边境防御造成的压力，斯大林下令将一批新的机械化部队和骑兵调往远东。截至1934年夏，远东苏军兵力已上升至11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650辆坦克和500架飞机，总兵力约23万人；而日本驻满兵力只有3个师团、1个机械化旅团、1个骑兵集团、3个独立守备队以及80余架飞机，兵力仅5万人，即使加上驻朝鲜的兵力，也不及苏军的三成。参谋本部认为，只有当驻满洲的兵员和飞机数量达到苏军的八成以上时，交战才有获胜的希望，而日方尚无能力在短期内填补兵力缺口。是故尽管此际苏联才是日本的第一假想敌，但日本入侵苏联的意愿明显小于侵华。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日本的扩张态势，莫斯科采取了一种姑息和诱导的态度。在纳粹党于德国粉墨登场且公开打出反共旗帜后，苏联红军不得不把三分之二以上的陆上兵力留在欧洲，防卫远东的能力受到了限制。有鉴于此，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苏联在北满铁路让渡谈判、《日苏石油协定》签署和鄂霍次克海捕鱼权交涉等问题上无不做出大幅让步，以缓解日本的“北进”攻苏倾向。1936年日德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后，莫斯科虽然一度拒绝签订《日苏渔业条约》修正案以示不满，但最终还是让旧约延长了一年。斯大林默许伪满洲国在苏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设立领事馆，还暧昧地表示愿以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接受外蒙古的独立地位。

斯大林老辣的手腕没有白费。到1937年初，大多数日本军人和政治家都认定：入侵中国的迫切程度和成功率远高过对苏开战，南京政府在“北海事件”和“绥远事件”中的强硬姿态也坚定了日方扩大对华挑衅的决心。4月16日，林内阁四相会议通过《第三次华北处理要纲》，决意不再寻求与国民党当局建立防共军事同盟，而要加快推进华北五省脱离中国。

6月9日，驻德大使东乡茂德发回电报：孔祥熙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已于即日抵达柏林，将会晤希特勒、戈林等纳粹要人，据悉将签署价值1亿马克的军火贷款协议。三个星期后，该代表团又转往美国，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进行白银出售谈判，预备以此项收入转购黄金，换取美方5000万美元的贷款。就在中美达成白银协定的前一天，1937年7月7日，日本陆军在卢沟桥挑起了冲突，全面侵华战争爆发。（2015年第32期《三联生活周刊》刘怡）